

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 政治参与

一项对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

赵刚印 著

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 政治参与

一项对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政治参与:一项对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赵刚印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208 - 09530 - 4

I. ①现... II. ①赵... III. ①公民-参与管理-对比研究-中国、印度 IV. ①D621.5②D7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6520 号

责任编辑 毕 胜 黄玉婷

封面设计 范昊如

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政治参与

——一项对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

赵刚印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198,000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250

ISBN 978 - 7 - 208 - 09530 - 4/D · 1784

定价 26.00 元

目 录

导论 规模与民主——超大规模社会中的公民政治参与

一、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现状与选题的提出 / 1

二、对中印公民政治参与比较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7

三、本选题的理论价值、基本思路 / 11

四、本课题的理论工具及主要研究方法 / 14

第一章 对公民政治参与社会生态的比较分析

一、公民政治参与中的历史因素 / 17

（一）影响印度公民政治参与发展的历史诸因素 / 18

（二）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历史因素 / 23

（三）丰厚历史遗产对中印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同影响 / 29

二、公民政治参与中的社会因素：种姓社会与宗法社会 / 30

（一）多世纪并存的印度：种姓社会与当代印度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 / 30

（二）宗法社会与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 34

（三）传统资源在中印公民政治参与中的双重作用 / 36

三、公民政治参与中的文化因素：宗教文化与儒学传统 / 37

（一）印度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质 / 39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及其对公民政治参

与的影响 / 41

(三) 中印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冲突与兼容 / 43

四、影响中印公民政治参与的经济因素:计划与市场 / 45

(一) 公民政治参与是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 46

(二) 不同经济环境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同影响 / 48

第二章 对公民政治参与结构功能的比较分析

一、政治参与的体制框架: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比较 / 52

(一) 印度式的分权结构:传统与现代性的交织 / 53

(二) 对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体制分析 / 57

(三) 中印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差异 / 62

(四) 案例分析:基层民主参与——中印乡村社会治理
的理论及其实践 / 73

二、政党政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 82

(一) 政党政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 / 82

(二) 印度政党政治及其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政治
功能 / 83

(三) 协商性政党政治与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 90

(四) 中印政党政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同影响 / 97

三、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公民政治参与 / 106

(一) 现代化进程中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与公民政治参与的
互动 / 107

(二) 中国与印度公民社会发育生长的社会条件及现状 / 110

(三)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政治参与——公民社会

发育及其政治功能 / 116

第三章 对公民政治参与效应的比较分析

一、公民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及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 129

(一) 公民参与对印度政治与社会生活带来的多重

效应 / 131

(二) 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效应的分析 / 150

(三) 中印公民参与对政治运行与社会发展效应的几点启示 / 157

二、公民政治参与与中印政党政治的发展演进 / 160

(一) 公民政治参与与政党的政治能力问题 / 160

(二) 公民政治参与与印度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发展演进 / 166

(三) 公民参与对中国协商性政党政治提出的新挑战 / 172

第四章 对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发展的前瞻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视野中的公民政治参与 / 180

(一) 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价值取向 / 181

(二)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视野中公民政治参与发展的现状

分析 / 188

二、从应然到实然：增强公民政治参与有效性的路径选择 / 191

(一) 政治参与主体的养成——公民意识的增强与公民

能力的提升 / 192

(二) 组织化参与:社会组织模式及其能力建设 / 200

(三) 党的“社会参与”和公民“政治参与”之间的互动 / 203

(四) 在参与式行政中实现公民政治参与与社会治理的

互动 / 207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规模与民主——超大规模社会中的 公民政治参与

一、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现状与选题的提出

公民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经典命题,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马克·彼特拉克所说:“公民参与是民主的希望”。^①科恩以政治参与作为关键词,为民主下了一个定义:“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②按照科恩的观点,民主的尺度至少有三个层面,即:民主的广度、深度和民主的范围。民主的广度是由公民是否普遍来确定的,属于民主的数量问题;民主的深度是由公民参与是否普遍来确定的,它与民主的性质相关。民主的范围则是指全社会实际参与决定问题的多少及其重要程度以及公民参与所起作用的大小,它牵涉到的是民主的效能问题。^③

鉴于绝大多数现代国家都已经赋予公民普遍的平等参与权,科恩

① [美]马克·彼特拉克:《当代西方对民主的探索:希望、危险与前景》,《国外政治学》1989年第1期,第1页。

② [美]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页。

③ [美]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页。

强调：“今日政治社会迫切需要的是扩展参与的深度”。^①即通过公民对政治生活的深度参与来提升民主政治的水准和质量。科恩的观点表明：一个社会民主政治的实现程度，同其成员以各种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多少、大小以及范围有关。由此看来，作为民主社会的衡量尺度及其发展而言，公民政治参与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②历史地看，公民政治参与这一概念是与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在西方学者眼里，长期以来，政治参与被看作是一个单一层面的概念，竞争性选举被当作是政治参与主要乃至唯一的方式，他们认为，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民众才可以通过定期举行的选举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偏好。

早期研究公民政治参与的学者有这样两个假定：一是政治参与需要有一个民主政体，二是选择领导人的权力是普通公民表达他们利益的必要条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西方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所谓的“极权模型”(totalitarian authority)，这一模型十分强调掌权者对民众的控制和动员，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集权模式”下，国家和政党完全主宰了社会力量，只存在着“集权体制”导向下的“政治动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所谓的“政治参与”不过是当权者用来构筑其政治合法性的工具，并不具有影响政策的实质性意义。在这些学者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设置不仅阻止了民众要求的顺利上达，而且也使公民失去了能够让政治精英们倾听他们意见和观点的必要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中虽然也有游行、示威以及各种“选举”活动，但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由当局组织以动员一般民众支持的政治行为，这种“参与”仅仅在表面上与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参与相类似。

上述西方部分政治学者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公民政治参与的看法当然是极为偏颇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东西方冷战的减弱以及社会主

① [美]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2页。

② 在当代西方政治话语中，公民参与尤其成为左翼人士的巨大呼声，自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已经先后出现了四种民主模式，即：保障式民主、发展式民主、平衡式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后一种民主都是对前一种民主模式的修正或改进。本杰明·巴伯提出了相对于“弱势民主”的“强势民主”概念，指出民主不限于选举国家领导人、选举民意代表等内容，而是要参与到行政决策和政府管理之中，“强势民主”要以扩大人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为核心。参见陶文昭：《西方国家的民主参与和民主行政》，《学习时报》第210期。

义国家内部的变化,促使他们对过去坚持的所谓“极权模型”进行重新思考,在对政治参与一般理论的研究方面有了新进展,政治参与的概念开始挣脱“民主政体”的框架,选举也不再被视为是唯一的利益表达形式,更广泛的渠道与手段被纳入了政治参与分析的范畴之中,原有的单一政治参与观,即将投票看作民众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关键乃至唯一方式的观点,被多元的参与观所取代。一些学者提出:共产党政权并没有完全消除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也没有完全堵塞人们利益的表达渠道,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私人生活和个人利益的表达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大多数西方学者仍然否认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通民众具有影响政治决策的可能性,认为有意义的政治参与需要社会中的某些制度安排将人民的政治活动与决策过程联系起来,而社会主义社会中所有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都是由当局控制和操纵的,其目的是消除自主性社会团体的形成,它们并不具有利益表达的功能,普通百姓的政治活动与决策过程之间并不存在有效联系。^①

很显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参与和西方国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以至于有些学者拒绝政治参与的概念可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②认为将这一概念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将会造成“严重的和令人遗憾的不准确”。^③对他们而言,政治参与是以多元的政治体系为前提的,“因为政治参与是一个帮助我们界定特定类型政体的概念,它并不适用于比较分析和用于描述那些明显不属于民主的政体”。^④他们建议重新定义政治参与以适应政治现实。例如,詹姆斯·汤森(James

① Liu, Alan P. L. 1976. *Political Culture and Group Conflict in Communist China*. Santa Barbara, Calif: Clio Books. p. 5.

② 参见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要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③ Joseph LaPalombara. 1975. “Monoliths or Plural Systems: Through Conceptual Lenses Darkly”, *Studies of Comparative Communism* 8(3). pp. 305—322.

④ Joseph LaPalombara. 1978.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munist Studies: Conceptualiz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Sidney Verba and Lucian W. Pye, eds., *The Citizen and Politic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tamford, Conn.: Greylock Publishers. p. 71.

Townsend)在《共产党中国的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一书中,就将中国的政治参与定义为“党的政策的实施”和“民众对由共产党所界定的最高的、统一的国家利益的政治行动支持”,或是“在政治决策实施过程中的导向性介入”。^①

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来看,公众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的大幕已经拉开,选举法、代表法、工会法、行政监察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一系列制度性文件的颁布与实施对公民参政议政的政治权利进行了法律上的确认。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了“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目标要求。^②近年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基础在不断扩大,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逐日高涨,实践层面上,各式各样的基层民主试验开展得如火如荼。中国公民对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是建立在特定政治生态之上的,“外发后生型”的政治发展特点使中国在各方面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即启动了政治民主化进程,这使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始终贯穿着一种“超前”态势,在认识与实践、目标与手段、形式与内容、精英与群众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和碰撞。^③这必然影响到公民的参与过程,使其表现出极其复杂的一面。但从总体上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所涉及的层级和范围正在呈逐步提升和扩大的趋势,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动向正在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如何选择正确的政治参与模式?如何稳步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显然,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实践的迅速发展已经向学术界提出了迫切的理论需求。

有理论上的需求就会有理论上的回应,需求愈急切,理论上的回应也就愈强烈,理论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及时答疑解惑,为现实提供理论指引。应该说,我国的理论工作者,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界对这

① Townsend, R. James. 1969.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4—6.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 页。

③ 徐宗勉等著:《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8 页。

一命题的反应是敏锐而迅速的，随着近年来对公民政治参与问题关注的逐渐升温，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从对政治参与的研究趋势来看，近年来学者们对公民参与的研究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从关注参与主体的行为转向关注参与主体的权利。选题体现出强烈的群体性特征，农民政治参与、村镇基层直选、民营企业主入党、少数民族以及妇女政治参与问题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第二，开始将制度外的、无序的参与纳入到政治参与研究的范畴中来，群体性突发事件等课题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第三，开始探讨新的政治参与途径，在继续关注诸如人大、政协以及行政监督等传统参与途径的同时，试图开辟新的渠道，政务公开、决策参与以及对非政府组织的社团、行业协会、社区组织等组织和形式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受到充分关注。第四，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某些研究主题开始向政治学领域流动，表现出一定的超前性和深化趋势，这有助于推动政治学领域对政治参与的理解。从法学角度对公民政治权利的研究，有助于政治学界对政治参与合法性的界定，社会学对政治参与组织行为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民众参与的动机和行为特征，为现阶段探索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提供可能。^①

上述研究分别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公民政治参与这一主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系统的发掘，对西方学界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参与的基本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对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特点及其成功经验做了初步总结，对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未来发展路径提出了一些前瞻性思考。既有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深入这一课题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相对来说，当前对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从研究角度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趋向：一是专注于经典的学理分析；二是致力于典型微观个案的解剖，而将宏观理论与微观个案结合起来展开研究的还并不多见。当然，这与公民政治参与目前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前期的理论积累和实践材料都还并不充足有关，毕竟，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参与理论并将它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民政治参与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以及对西方的政治参与理论进行合理扬

^① 《社会科学报》2005年8月4日。

弃,都是颇为艰巨的理论工作。从研究内容来看,当前的研究更多的是将政治参与作为一个应变量来分析,关注的热点主要集中在诸如社会转型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当代中国农民以及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基层的直接民主选举等方面,而将政治参与作为自变量来研究的却不是很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公众参与将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将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客观现实。它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为公众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随着公众参与的日益广泛和深入,要研究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后果,比如:如何处理好公民社会与政府的权力边界问题;如何处理好公众参与的进程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公民政治参与同政党政治发展与政党执政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充分的公民政治参与同保持足够政治权威和政治能力的问题;等等。此外,现有研究对公民政治参与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及其有效性,市民社会的发育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超大型社会政治参与的特殊性等也缺乏系统分析。从研究手法上看,当前研究比较多的是侧重于实证研究,综合分析和理论提升不够。实证研究对推动公民政治参与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它提供了第一手的、鲜活的实践素材,是对公民参与所有问题探讨的逻辑起点,但如果将研究视野长期停留在这一层次上,其理论价值必然会有所折扣。因此,在实证研究基础上适时进行必要的理论总结是极为必要和必须的,这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问题的讨论。

在当前有关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中,学者们在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的发掘、诠释和对国外政治参与理论系统介绍的同时,也将研究视线投向国外,对不同国家政府公共行政管理、法制化进程以及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比较研究逐渐增多,对政党政治的比较研究也为人们所广泛关注,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相继问世,但从公民政治参与的角度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比较研究还是比较少见的。实际上,许多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也同中国一样,正处在公民政治参与的初始阶段或者积极推进中的某一节点上,对它们来说,如何在保持政治秩序稳定的同时,不断拓展参与渠道,提高参与效能,提升公民适应社会政治体系的能力也是十分紧迫的问题。因此,在继续致力于对当前中国政治参与

实践研究的同时,同样也需要我们立足国情,放眼世界,从对各国公民政治参与与实践的比较研究中,把握规律性,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基于上述考虑,本课题选择了对公众政治参与的跨国比较研究这一视角,试图将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置于现代化发展这一广阔历史进程,在比较中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公民政治参与发展演进的共性与规律,总结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经验,评估公民政治参与所可能带来的一系列政治效应,展望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趋向与前景。

二、对中印公民政治参与比较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比较研究必然涉及一个研究对象的选择问题。客观地说,世界上任何两个政治体系或政治现象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只不过彼此间相似的程度不同而已,之所以能够进行某种“比较”,就是因为选定的比较对象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可比性。作为民主和民主化问题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公民政治参与问题一直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经典命题,因为民主化问题是一个民主不断完善、不断消解障碍和消极因素的永恒的问题,它只是过程,没有终点,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行走在政治民主化历程中不同位置的某一关节点上。因此,比较各民族国家和地区在民主化发展过程中的现状、趋势和原因,永远是比较政治学中一个经久不息的主题。^①

在比较研究的对象选择上,本选题选择了印度作为一个比照对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挑战,因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选择印度有许多的“弊端”。虽然近年来我们对这个同样是发展中大国的邻居的关注越来越多,但大家的主要兴奋点是其异军突起的“软件产业”以及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再有,就是对印度古典文化的恒久兴趣。而对印度政治领域和社会发展的研究却仅止于一般的介绍,系统性和理论性都

① 欧阳景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困境与发展前景》,《社会科学》2005年3期,第44页。

远远不够,前期研究成果的不足无疑增加了课题研究的难度。而之所以选择印度作为比照对象,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规模与民主”问题的思考。中印两国同样都是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都是所谓的“超大规模社会”,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共性因素,而中印两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又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共性与差异性的广泛并存增加了这一项比较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其实,在政治学上历来就有这样一个理论悬案,即大国是否适宜于民主政治。在西方,“规模”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是政治学家们十分关注的话题,“民主只能与小规模社会相吻合”是西方古典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主流观点。孟德斯鸠也说过:“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宜于由君主治理,大帝国宜于由专制君主治理”。^①但到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民族国家代议制政府的建立与发展,民主只适合于小规模城邦国家的观点逐渐式微,民主也可以与大规模社会相融合的观点在实践中得以确认,但规模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依然值得分析和探讨。对类似于今天中国和印度这样的超大规模社会而言,其民主政治成长的环境既有同其他国家相类似的地方,也因其“超大规模”而有自己的特殊性。

在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里,人口规模和社会规模对政治发展带来了许多直接和间接的特殊影响,在可资运用的政治与经济资源一定的情况下,适度的社会规模是社会成员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必要保证。否则,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会激化并陷于恶性循环。不管以何种维度来分,不同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经济、文化、政治上的矛盾甚至冲突。^②“超大规模”使得在一些小规模社会中微不足道的问题被上百倍地放大,经济社会问题是如此,政治领域的诸多问题也同样如此。因此,就当代的“超大型社会”而言,对“规模与民主”问题的研究依然十分必要。

而在中国政治学界,长期以来却很少有人对“规模与民主”问题进行过深入系统的探讨。较早呼吁从规模与民主的角度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是王沪宁先生,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在谈到完善和构筑中国特有的政治体系模式时就曾经指出:“在研究和发展完善的民主政治

①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26页。

② 参见陈义平:《论人口变动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1999年第3期。

模式时，自然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特点结合的问题。我这里说的是，在现有民主制度的水平上向更高层次进展，在既定原则基础上向建立完整操作体制进展。”他认为，研究当代中国政治，至少要研究并确定五个方面的问题：^①1. 超大型社会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2. 党执政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3. 公有制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4. 社会资源总量有限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5. 伦理民主与法理民主之间的关系。王沪宁认为，超大型社会是指中国社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大型社会，主要表现在其最大数量的人口规模上，不言而喻，民主政治首先是全体公民参与的一种政治，其次也是对全体公民实行调控的一种政治，因而它的存在和运转与人须臾不可分开。就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来说，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我们不折不扣地选择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接下来是如何在中国这个“超大型”社会中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体系的问题。^②而超大型社会的公民政治参与问题无疑是这一重大课题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方面。

就中国和印度这两个“超大规模社会”来看，它们都有着璀璨悠久的历史文明，近代历史上曾经遭遇过相似的命运，但两国政治现代化的启动却又是截然不同的：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作为政治发展目标，印度则选择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自独立以来就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同时，在当代世界，中印两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是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大国，进入 21 世纪，中印两国相继迅速崛起，其发展前景被一致看好并呈相互竞争之势，这种竞争，既是经济领域的短兵相接，而在其背后，实际上也蕴涵着两种社会道路、两种政治发展模式的潜在竞争。作为两个崛起中的大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又都具有人口众多、社会多样的特点，它们的一举一动，都不仅仅是它们自己的事情，也是亚洲和世界的大事件。

最近几年，将中国与印度相比较的文章、书籍和召开的会议越来越

^① 王沪宁：《构筑中国特有的政治体系模式——〈中国政府与政治〉序》，转引自高民政主编：《中国政府与政治》，黄河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 页。

^② 高民政、孙艳红：《规模与民主：西方的争论与达尔的总结》，《浙江学刊》2005 年第 3 期，第 121 页。

多,政界、商界和学界对它们的发展现状、发展模式和发展潜力都兴致盎然,将中印两国的各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已成为学者们和政府官员们热衷的一门“显学”,“Chindia”这一新词汇也应运而生。^①目前,对两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经济学家们对中印两国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津津乐道,并对它们各自的发展前景进行着种种预测。实际上,这种比较并不全面,两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宗教与民族关系,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对外关系,国家发展战略,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社会利益分层化、集团化,民族个性与社会发展模式等,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研究的。但总体上看,对两国政治发展的比较还并不为人们所关注,而公民政治参与的角度无疑是推动这一领域比较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②

在探讨对公民政治参与进行跨国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时,一

① “Chindia”是 China 与 India 的合成词,一般译为“中印”或“中国和印度”。

② 近年来有关印度政治发展与公民参与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峰君教授在《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一书中对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林承节教授在其主编的《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一书中就印度议会民主制的确立和初步实施以及印度政治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有创建性的研究,尚云鹏教授在《种姓与印度教社会》一书中就印度种姓制度对印度政治生活的影响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林良光教授在《印度政治制度研究》中则专注于研究印度的政治制度问题,曾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政务参赞的曹小冰的《印度特色的政党和政党政治》一书中,对印度特色、日渐成熟的政党政治及其在印度政治现代化中的作用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此外,相关的著作还有李芳、刘沁秋的《印度:在第三条道路上踟蹰》,陈峰君的《印度社会述论》,高颀、张敏秋的《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等。国外研究印度政治发展的著作主要有:阿姆里塔·巴苏在《印度的社团冲突与国家》一书中对印度国内的各个利益集团及其对印度政治生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斯坦利·A. 科查内克在《印度国大党—党民主制的动力》就国大党内部结构的变化情况及其对印度政坛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罗伯·詹金斯在《印度的民主政治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考察了印度自由化改革和民主政治、利益集团、公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此外,近年来还出现了 G. 阿乐斯的《印度并非一族的民族主义》、巴勒的《南亚民族的起源:近代印度形成中的爱国主义和道德政府》、巴特赫·查特顿杰《自由的代价:印度民族近代国家的 50 年》、格瑞普特·马哈詹的《认同与权利:印度自由民主的外观》等新作,分别对印度政治与社会的有关问题作了研究。总体上看,有关印度政治参与的前期研究成果是比较匮乏的,上述研究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印度公民政治参与的历史与现状,但系统性和深度都比较欠缺,还没有给我们展示出在印度这一超大规模社会中公民政治参与的全貌。也正因为受前期研究成果薄弱的限制,我们对这一比较研究的框架设计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其全面性和系统性,而是从现有基础和可能条件出发,有选择、有侧重地就中印两国政治参与中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